

西方译学理论辑要

Excerpts from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est

杨建华 编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TJ05-YW0204)

西方译学理论辑要

Excerpts from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est

杨建华 编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提 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古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一百五十余名译论家及其理论,内容包括对其生平及重要译论的介绍与评述及其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译论史稿的辑选,以历史分期为线索逐人编写,是一本具有史料性质的西方译论案边资料。

本书作为翻译专业用书,适合攻读翻译专业的研究生、外语专业大学生、外语教师及对翻译理论感兴趣的人士或专业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人士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译学理论辑要/杨建华编著.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618-2892-2

I. 西… II. 杨… III. 翻译理论-西方国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9490 号

组稿编辑 赵淑梅 责任编辑 赵淑梅 装帧设计 谷英卉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杨欢

地 址 天津市卫津路 92 号天津大学内(邮编:300072)

电 话 发行部:022-27403647 邮购部:022-27402742

印 刷 迁安万隆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169mm×239mm

印 张 33.25

字 数 1208 千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

印 数 1-2 500

定 价 49.0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向我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方译学理论辑要》以较经济的方式介绍了西方从古至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译学家及其理论(本书的编排方式无疑也是最为经济的),不但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及重要理论,而且还介绍了其史稿摘录。这部作品集传记、原汁原味的译论于一体,是到目前为止笔者所见到的收录资料最全、论及人物(152人)和译论最多、编排形式和编排思路最具特色的著作。洋洋百余万字,凝聚着作者的辛勤汗水,同时,这也是对杨建华先生心仪的介绍,为外语专业的师生们提供一部集西方译论外文史稿于一体的案边参考资料。

总体来看,本书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色。

(1)独具特色的编排思路。本书不但将历史分期作为主线、流派作为暗线来处理,而且在以历史发展线索为主的同时,也考虑到国别与地域的译论特点,很好地体现了理论史的继承性和关联性。以历史分期逐人编写,有利于将某个理论家的重要译论全面系统地从其筛选的史稿中反映出来,也有利于读者较全面地了解某个时期某个译论家的重要译论。

(2)别具一格的章节编排形式。本书章节的编排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即译学理论家生平及其重要理论和译论史稿辑要。这种编排有利于激发读者的兴趣,有利于读者研习某译论家理论的核心部分,有利于读者掌握西方译论的内核,更有利于读者准确地运用西方译论。

(3)独具匠心的历史分期和翻译研究类型。中外学人对西方译论历史分期的看法不尽相同,各有所长,而杨先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对比研究,根据“人们的思想总是受历史环境影响”的论断,并结合本书的内容特点,将西方译论的发展分为古典译论和现代译论两个时期。古典译论时期历经两千多年,为现代译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代译论则以古典译论为基点,蓬勃发展。对西方译论流派的梳理和归纳,国内外学者也持不同观点,因为他们的观察角度和观察目的不同。由于西方林立的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是完全独立或对立的,而是交叉互补的,因此杨先生根据本书的具体情况及其研究成果,开创性地将西方译论的研究归纳为文学类型的翻译研究、语言类型的翻译研究和人文类型的翻译研究,以有别于流派或学派的概念。将各流派归入上述三种类型的目的,是要揭示其关联性。

(4)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借鉴并谋求发展。本书辑选的是西方译学理论史稿,目的在于方便国人学习西方译论。而学习西方译论的目的仍在于振兴我们自己的译论研究。我们应在学习借鉴西方译论的同时,大力发展我们自己的译论,为世界译论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5)预见译论的未来发展趋势。本书在选录西方译论的同时,还对未来的译论发展做出预见,认为未来的译论发展除在翻译本体的研究方面会有更大的突破外,机器翻译的研究也会迈出更大的步伐。

(6)宏观古今中外译论研究,提出“语境”新解,开创性地提出“跨文化语境系统移植”的译学新理论,并提出将此作为中国译学理论与西方译学理论同步发展的共同理论平台的具有建设性的见解。

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一系统介绍西方译论史稿的著作填补了国内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

空白。近些年来，国内在引进外国原版翻译著作和翻译外国翻译著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典型的要首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引进的“国外翻译研究丛书”，它大大促进了我国的翻译教学和研究事业。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所引进的原版著作，无论是译论家或著作，都不及国人所需要之十一。再者，整本啃读这些著作也是很费劲的。有些人根本就没有吃透原著，就急于运用西方译论来写文章，赶时髦，导致一些外国翻译理论使用不当的情况时有发生（林克难：“外国翻译理论的实用性研究”。《中国翻译》2003年第4期，44~46）况且很多西方译论是杂于各类论著之中的，这就更增加了学习的难度。因此，将具有代表性或时代性的译论撷选出来就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有意义。正如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宏印教授所言：“如果读者能够和同类书籍参照阅读，最好是能够参照原文仔细阅读，则收获会更大。”杨建华先生所从事的正是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

目前，我们已置身于一个全球化时代，翻译研究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笔者喜欢翻译，也喜欢翻译研究，更喜欢对国内外最新出版的翻译著作评头论足，因此写书评已成为我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约半个月前，国外一翻译研究刊物寄来去年出版的新书三部，约写书评。令人振奋的是，我在其中的一部里又发现了翻译研究的新动向。这部书名曰*Less Translated Languages*（Albert Branchadell & Lovell Margaret West.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2005），而汉语也是其中的语言之一。Less translated languages, 这是在Mona Baker主编的*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1998）、Mark Shuttleworth和Moira Cowie编撰的*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1997）以及方梦之主编的《译学辞典》（2004）里根本无法找到的术语，指的是“all those languages that are less often the source of transl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linguistic goods, regardless of the number of people using these languages”。该书中还提到翻译研究的一个新转向，即“From the ‘cultural turn’ to the ‘power turn’”。看来，我们只有加倍努力，发愤图强，才能赶超世界译论先进水平。

许建忠

2007年3月9日于天津

(一)

萌生拙书编写之意，缘起于近年受学院委派讲授西方翻译理论课程。一旦执鞭，方知此任之艰。原因有多种，难觅一本辑西方译论史稿之要于一书的案边资料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终觉教师和学生手边缺少这样的一本书很是不便。况且，很多西方著名译论家往往同时又是著名哲学家、语言学家、翻译家、文学家、社会学家等等，著述繁多，其很多重要译论又往往杂于各类论著之中，如哲学著作、语言学著作或译作前言甚至诗歌或演讲词等。将其中具有代表性或时代性的重要译论辑选出来汇成一书，应该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有聊胜于无。此其笔者不揣驾钝萌生编写本书的最早动因之一。

编写本书的另一动因是感怀于人类对翻译理论所进行的艰苦不懈的探究历程。本书曾拟名为《巴别思录》(*Ponders of Babel*)，后经杨自俭老师指点改为《西方译学理论辑要》。在荒渺莫考的太古时代，自示拿的巴别城塔(通天塔)败毁之后，世界从此便进入“巴别后”时代，诺亚的子孙们也从此开始其悠悠无期的冥冥苦思与自省。德里达将巴别的矛盾说得很明白：对于语言的混乱，翻译是“一项必需而又无从实现的工作”，即是说，翻译将永远地处于“可译而又不可译”之中(见本书德里达一节)。然而，“五方之民，言语不达，嗜欲不同”(《礼记·王制》)的语言和思想的“混乱”，恰酿成宝贵的民族文化的多彩世界，人类对于巴别沉思的方向也准确地定位于“达其志，通其欲”(《礼记·王制》)的译事探究，历经数千年的岁月而不息。因此，诺亚的子孙既是明智的，也是坚韧的。繁星般的译学大家在翻译理论的殿堂寒宫中的孜孜求索，是对有志于译学理论研究的后人最好的感动和激励。本书所辑录的即是这些可歌可泣的“巴别后”的关于语言与翻译的思索。

王宏印教授曾对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如此感慨：“如果读者能够和同类书籍参照阅读，最好是能够参照原文仔细阅读，则收获会更大。”(见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代序“昌明传统，融化新知”，2004：11)因此，提供一本以原文为主的具有史稿性质的西方译论辑要便成为本书的又一编写动因。从历史的实践来看，西方译学理论大大开拓了中国译学研究的视角，有很多内容直接融入中国的译学研究，大大繁荣了中国的译学研究。但如若引进西方译论长期以译介形式为主的话，人们不免会产生忧患。翻译本身即处于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论之中，翻译理论本身的翻译更是一大挑战。由于语言之间的差异程度，西方语言之间的翻译求等易，而中西语言之间的翻译求似却也难。因此，仅仅依靠汉语翻译来推敲西方译论概念的内涵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可靠的，尽管译者的翻译是高超的。因此，学习研究西方译学理论一定要读到外文原文。本书在辑选西方译论时便是出于此种考虑，在“译论史稿辑要”中尽量采用原文形式。如原文属非英文但有英文译文的，尽量采用英文，不得已时才偶用汉语。

(二)

本书的编写是以历史分期为线索的。

当然，本书的编写可选择不同的方式：可以依照流派研究的思路，但这样做“容易写得浮，‘只见林不见树’，在未发掘和占有详尽资料时容易‘以论带史’”(陈福康语，见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1992：6)；也可以依照历史分期，这样做的优势在于史料性较强，且有利于对每

个译论家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述评。本书的编写采纳的是后者,即以“史”为出发点,以史及论。

在梳理西方译论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历史上的某一译学理论家往往不是可以简单地归于某一流派的,其理论贡献也往往不仅限于某一流派的理论。安德烈·勒非弗尔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一书便超越历史,依照思想意识、赞助人的影响、诗歌翻译、文化话语域、翻译及语言发展与教育、翻译技巧、中心语篇与中心文化等主题进行编辑,因此理论梳理清晰。但某一理论家的译论则有可能散见于不同的主题章节中。如欲将某一位理论家的重要译论及贡献简洁而全面系统地反映出来,这正是杨自俭老师为本书提出的“原则”性建议之一,那么还是应以历史分期为线索、逐人编写为上。

没有按照“流派”(或“学派”)来写,不等于无视“流派”的存在。杨自俭老师为本书提出的“原则”性建议首先便是“理论史要有继承性,前后要密切关联”。强调史的“继承性”,流派则是重要线索。因此,即使依照历史分期来写,流派问题也是不容忽视和回避的,始终是理论史的联系纽带。

本书最后确定按照历史分期来编写,还是出于对如何学习研究西方译学理论的反省。

如何学习研究西方译学理论,同样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以某一流派、某一译论家为研究方向和突破口,此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二是将西方译学理论作为整体进行历史性的跟踪研究,这样有利于把握整个译学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以求进行全景式的较为全面系统的透视。两者皆不可废。但是,就学习研究西方译学理论而言,“断其一指”,更要“伤其十指”。特别是对于广大学习研究翻译理论的学生或研究人员来说,强调这一点更具有实际意义,因为西方译学理论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是其开拓创新性与历史承继性共存。没有对西方译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承继性全面系统的了解,是很难理解其理论的开拓创新性的。发展中国的译学理论研究最需要引起注意的便是盲目性。盲目性会导致译论研究走弯路,历史上是有教训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和透视西方译学理论的发展,探索其发展的内在原因及经验教训,可以说仍是翻译理论教学的当务之急。因为这样才有可能更好地、理性地展现而不是封闭中国译论发展的非常有希望的巨大空间,从而避免或减少盲目性的发生。

本书尝试将历史分期作为明线、流派作为暗线来处理。

如何按照历史分期来梳理浩繁的西方译学理论对于本书来说始终是个课题。

乔治·斯坦纳将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9世纪为第一个阶段,主要以翻译实践与实践经验总结为主;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为第二个阶段,属于初步理论探讨阶段;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为现代时期,即第三个阶段,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带动翻译理论快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为第四个发展阶段,跨学科研究促进翻译研究的快速发展。

纽马克将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大略分为两个时期,即公元前55年至20世纪初为语言学前时期,从20世纪后期开始为语言学时期。

我国的刘宓庆先生将西方译论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古典译论至18世纪末的坎贝尔和泰特勒;18世纪末施莱尔玛赫至20世纪中瓦勒瑞;翻译理论的语言学派的兴起;20世纪70年代至今。

谭载喜先生将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分为古代翻译译论、17世纪至19世纪翻译译论和20世纪翻译译论。

王宏印先生依据学科理论基础将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简洁地分为三个阶段:语文学阶段,即现代语言学诞生之前的漫长的译论发展阶段;结构主义阶段,以现代语言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建立为起点,以将语言学理论用于讨论翻译问题并作为翻译的理论基础为基本特征;解构主义阶段,以对结构主义的反叛为特征。

关于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的梳理,迄今中外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大的侧面,一般是将西方翻译理论体系分为两条线索,即文学线索(语文学派)和语言学线索(语言学派)。这种分法基本得到了翻译界的公认。近现代以后各种流派纷呈。李文革将根茨勒、奈达及我国学者谭载喜、张南峰与陈德鸿等人关于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的划分进行了归纳,综合为七大流派,即翻译的

文艺学派（包括20世纪前的文艺学派、20世纪的文艺学派、20世纪之前俄国的文艺学派和20世纪之后苏联的文艺学派等）、翻译的语言学派（包括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美国结构学派、交际理论学派、德国功能学派、前苏联语言学派等）、翻译的研究学派（包括早期翻译研究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学派等）、翻译的阐释学派、翻译的解构主义流派、美国翻译培训班学派、法国释意理论学派。

其实，西方这些林立的翻译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非完全独立或对立的，而是互有交叉互有补充，其不同在于研究翻译理论的角度和出发点不同，而对这些流派的划分更是受到观察角度和观察目的的影响。

时至历史的今天，如若将西方翻译理论众流派作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将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以有别于传统的流派或学派概念），即文学类型的翻译理论研究、语言类型的翻译理论研究和人文类型的翻译理论研究。

文学类型的翻译理论研究将翻译视为文学艺术，从文学创作和再创作的角度以及审美视角对翻译行为进行研究，侧重于翻译标准及翻译方法的探讨；语言类型的翻译理论研究从语言结构及语言功能的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着重于原文与译文的对等或等值及语篇的语境等问题的探讨；人文类型（即社会文化类型）的翻译理论研究则从哲学、政治、思想、文化、社会、交际等背景的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聚焦于原作、译作、作者、译者、读者关系及地位以及对文本的解读等有关问题的探讨。如此，各种流派或学派便皆可归入上述三种类型的翻译理论研究，其关联关系亦昭然可见。

值得重视的是，翻译理论流派或类型的划分均应视为相对的，各种流派或类型均相互关联；更为重要的是，所有的流派或类型均以哲学、语言学、文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及符号学、信息学、认知学、美学、文化研究、计算科学等学科的相互接缘作为其理论基础。例如，语篇及语境理论既对语言类型的翻译理论研究具有指导作用，也对文学类型和人文类型的翻译理论研究具有指导作用。

综合上述各家关于历史分期见解之长及上述本书对翻译理论研究三种基本类型的分类，并结合本书的内容特点，本书拟将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主要分为古典西方译学理论和现代西方译学理论两个部分。

古典时期的西方译学理论始于西塞罗、贺拉斯，大约止于18世纪末，主要是围绕早期的文学类型的翻译理论研究和早期的语言类型的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而展开的。这两种翻译理论的研究都是历史悠久的研究类型，语言类型的翻译理论研究的发轫略迟，大约肇始于奥里利厄斯·奥古斯丁；文学类型的翻译理论研究的发轫则最早，从西塞罗和贺拉斯起便已拉开序幕。

人们的思想意识会受到历史环境的影响，翻译理论的研究亦是如此。因此，古典译学理论时期又分为古代早期西方译论、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译论和近代西方译论三个阶段。这一时期的译论特点是主要讨论应该主张直译的翻译方法还是意译的翻译方法、翻译的忠实问题及风格的传递等问题，翻译内容则主要以古希腊文化的翻译、宗教翻译及人文作品的翻译为主。这一时期的译论研究历经近两千年，为现代译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代时期的西方译学理论开始进入更深层次的研究阶段，大约始于19世纪初。其标志为：一是传统的文学类型和语言类型的翻译理论研究的纵深发展和领域的拓宽使得缓慢发展的西方译论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流派纷呈，其理论更具系统性（相对于古典译论侧重实践性的特征而言，从本书所辑录的译论段落即可看出其端倪），跨学科性研究突飞猛进，即翻译理论的系统化、学科化和接缘化特征愈来愈明显；二是以翻译的“文化转向”为导向的人文类型的翻译理论研究的异军突起及迅猛发展（影响之大甚至导致了文化的“翻译转向”趋势——苏珊·巴斯奈特语，见本书巴斯奈特一节），以及“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翻译学学科命题的正式提出。本书将19世纪的现代译论称为现代初期西方译论，而将进入20世纪之后的现代译论称为当代西方译

论。西方译论在当代译论时期真正进入全面繁荣发展的阶段。

近年来,随着符号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研究的深入发展,语篇翻译、隐喻、体验哲学、句法迁移、语境层次、认知模式、关联理论等逐渐深入翻译理论领域之中,推动着翻译理论的发展。然而,如果据此便断言现在西方译论已经进入后现代阶段恐为期尚早。

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总体来说处于不断加速的过程,而且加速的过程愈来愈快,这一点仅从本书的目录便可看出:时间跨度越来越短,而涌现的著名翻译家及译论流派则越来越多,译论的学科支撑基础愈显坚实雄厚。

翻译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问题也同样日益引起西方译论家的关注,成为现代西方译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本书在辑录西方译论时充分注意到这一点,也辑选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关于译论未来发展的见解,特别是关于译学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问题,译学理论的现代化问题,译学学科的性质、建设与地位问题,专门译学理论人才的培养问题等。

需要顺便一提的是,德里达坚持认为翻译的概念问题即是哲学的中心问题,因此其解构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语言与文字的理论必然会对传统翻译理论形成深远的冲击。目前,关于文字的“理据性”和“本位”问题的讨论与争论,在中国的文字学研究领域已经并正在引起巨大的震动,这场震动势必会波及整个译学界,而诗性的文学翻译又会首当其冲,值得拭目关注。这也是本书予德里达“重要译论”较多笔墨的原因。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翻译理论的发展除在翻译本体的研究方面会有更大的突破外,随着时代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机器翻译方面也一定会迈出更大的步伐。目前的机器翻译研究可以说日新月异,但由于翻译理论及技术的制约,使其朝着完全实用可靠方向发展尚需相当的时日。在这方面,语料库的研究发展将发挥极其关键的作用。本书没有更多涉及机器翻译方面的内容,是因为仍期待着在翻译理论与机器翻译配合攻关方面能有新的实质性的突破。诚然,翻译几乎与语言、文化、美学、哲学等所有学科紧密相关,机器是很难完全胜任这项工作的。但是,近年来计算机在写作、绘画等方面不是已经迈出了具有意义的第一步吗?相信随着翻译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如计算机的进一步智能化及计算语言的发展,机器翻译实现重要的突破应该不会为期太远。为此,本书特地辑选了一部分有关语料库和计算语言的论述。

本书的编排在以历史发展线索为主的同时,也考虑到国别与地域的译论特点。国别与地域对于译论流派的形成有其内在原因(如低地国家和以色列),这一点毋庸赘言。因此在译论发展的某一历史阶段内,本书的编排则是以国别与地域为线索,以尽量“体现理论史的继承性和关联性”。

本书编写的一个特点是,在每一节中设有该节所要介绍述评的学者的“生平及重要译论”一栏,对其生平及重要译论做出简洁的系统介绍及评述,使读者对该学者身世、学术背景及译论有个大体清晰全面的了解。为便于读者阅读和查阅起见,特另辟“译论史稿辑要”一栏,将大部分所需介绍、评述的该学者的译论尽量集中于“译论史稿辑要”一栏。可在阅读“生平及重要译论”一栏的同时对照参阅“译论史稿辑要”一栏的内容。

出于“为我所用”的考虑,也为了节省篇幅,本书没有整篇、整节地选编原文,而是撷取其中的一些片断或段落,特别是那些论述精炼的部分或常被引用特别是常为国人所引述的部分。也正因此,本书最后成稿时将所选篇幅及所选译论家均压缩至原稿的三分之二左右。

正如了解一位作家的生平有助于对其作品的深刻理解一样,了解译论家的生平特别是学术背景也将有利于对其译论的理解,因此本书对译论家的生平特别是学术背景的介绍也较之其他书籍更为译尽一些。

由于上述编写特点,本书实际上相当于学习研究西方译学理论的一个导引,方便广大读者了解 and 借鉴西方众多的译学理论家及其译论。如果需要在某一方面深入探究,可继续参阅有关出版

社出版的原著资料及有关的系统译介。

(三)

本书编写的目的之一在于方便国人学习研究西方译学理论,但最终目的则是通过借鉴西方译论,在全景式对西方重要译论史稿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寻求中国译论与西方译论同步发展的共同理论平台,并在此基础上创立具有中国译学研究特征的翻译学派,以振兴中国的译学理论研究。

西方译学侧重微观研究,传统中国译学则侧重宏观研究,中西译论各有所长。引进西方最先进的各流派译学思想无疑是有益的借鉴,因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翻译理论虽各有特点却都是相通的。这已为历史所证实。

东西方的译学研究既要各走各的路,也要相互借鉴。东西方各自的译学研究并非要争出孰高孰下。译学理论不应以高下相论,而只有发展的快慢之说。中国的译学理论研究要与西方共同发展,首先需要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目前,这种借鉴研究已经初见成效。至于借鉴的目的,应该是东西方译学理论研究能够做到并驾齐驱,互相借鉴,互相弥补,共同繁荣,共同发展,这样有利于整个译学理论的健康快速发展。西方译学理论研究有其特点和优势,而中国由于在语言、文化等方面与西方的巨大差异性,在译学理论研究方面具有更大的潜在优势。中国译学理论研究离不开借鉴西方译学理论研究,中国译学理论发展的同时也是对西方乃至整个译学理论研究的贡献。很多西方著名译学理论家、语言学家都曾学习研究过汉语甚至曾亲自来华学习研讨翻译和语言理论并促进其理论的发展便是明证。

透视中国和西方的翻译发展史和译论发展史,中国译论与西方译论同步发展的共同理论平台可能已经显现在我们的面前。也就是说,译学理论发展到历史的今天,已经又一次到达历史性跨越的新起点。

中国译论和西方译论曾长期走在相似的发展轨道上。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有着悠久的古典译论发展时期,译论的焦点都在于直译与意译、可译与不可译之争,延绵竟千年之久。

古罗马的西塞罗和贺拉斯相传是西方最早谈到翻译理论的,他们明确主张意译,坚决反对逐词死译。据考证,支谦和后秦僧人鸠摩罗什是中国古代最早谈到翻译理论的,他们同样明确主张意译,坚决反对逐词死译。西塞罗、贺拉斯与支谦、鸠摩罗什不谋而合,他们都是最早提出意译与直译(“文”与“质”)两种基本翻译方法分野之说,而且都主张意译,反对逐词死译。

显然,不论中国还是西方,翻译理论的发端都是由反对逐词死译而主张按照意义来进行翻译开始的。东西方在译论发轫之初都要走在这样一条相似的轨道上,而且直译与意译、可译与不可译之争都延绵如此之久,这绝非偶然。古人在原始的翻译实践中逐渐意识到,所谓翻译,远非搬字过纸这么简单,在语言的背后一定还存在一个更为神秘、更为复杂的背景性的东西。由于缺乏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等各种学科的理论支撑,古人只能感知到这个背景与意义有着直接的关系。

根据现代翻译理论,这个语言背后的神秘背景已经被揭示出来。它就是语境(context)。无可置疑的是,任何术语一旦进入包罗万象的翻译理论中,便不可避免地发生词义的“宽化”,即其内涵与外延均由原“窄式”定义向“宽式”定义发展。语境亦不例外。自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正式提出语境概念并将其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以来,弗斯(J.R.Firth)、韩礼德(M.A.K.Halliday)、莱昂斯(J.Lyons)、海姆斯(D.Hymes)、维索尔伦(J.Verschueren)及斯波伯和威尔逊(Sperber & Wilson)等或从情景语境的要素,或从语境的划分,或从语境内涵,或从语境变量,或从语用角度,或从语言使用的关联性角度出发对语境进行了不断的研究和论证。今日的译学理论已经赋予了“语境”更为深广的蕴涵。

从跨文化角度来看,原作是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包含有语汇与语法两个层次组成的结构性语篇文本系统和包含有语义与语境的语义—语境系统。因语义与语境的不可分性即语境对语义的依附性,在

翻译中语义—语境系统可以简称为跨文化语境(context across cultures)系统。实际上,文本信息解读为跨文化语境系统的过程和跨文化语境系统解读为文本信息的过程属于转换过程,源语跨文化语境系统(第一语境系统)和译语跨文化语境系统(第二语境系统)之间的关系则属于移植(transplantation)关系。其实,古人可能早已意识到作为翻译实践的核心跨文化语境系统的存在及其移植对于翻译所具有的意义。早在一千六百多年前古罗马的圣哲罗姆便已使用“移植”一词来阐述其翻译思想,实在是难能可贵,至今难掩其光辉。德里达谈到翻译时,也使用了“移植”一词:“当我说翻译时,不只是语言上的,也是整个文化环境的移植。”德里达的这一论断寓意是很深奥的。至于希基(Hickey)提出的“重新语境化”(recontextualisation)则是从语用学的视角向“移植”学说所做出的试探性理论逼近。中文“翻译”一词的更为正式的说法是“移译”,“翻”即“移”,即“译”是通过“移”来实现的,而英文translate一词的前缀trans-的本意即为“转移、横跨”,可谓不谋而合。

纵观西方现代译论的种种流派,从语言学派、文艺学派、结构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及至交际理论学派、功能学派、阐述学派、释意理论学派、文化学派、描写学派、综合学派、多元系统学派等,其研究方向无一不指向跨文化语境系统,无不从微观的不同视角试图揭示出跨文化语境系统的真实面目。中国现代译论的种种学说,从“求真”说、“厥中”说、“神韵”说、“神味”说、“风韵”说、“丰姿”说及至“神似”说、“化境”说等,其研究方向也无一不指向跨文化语境系统,却是从宏观的视角试图揭示出跨文化语境系统的真实面目。一言以蔽之,中外不论是哪个学说或流派,他们在翻译理论上每前进一步,都是朝着揭开“跨文化语境系统移植”的神秘面纱迈进的一步。

移植是将某有机体移栽至另一异域环境中使之在新的异质环境中适应并生存下来,或使之融入异域环境以补足异质环境之不足。这恰是翻译目的之所在。首先,移植具有“适应并生存”的特征,即被移跨文化语境系统需要适应移入语境的异域异质语言环境以发挥翻译的跨文化对话与交流的功能。其次,移植还具有“融入并补足”的特征,即移入跨文化语境系统可以补足和丰富译语语言环境,且体现在语言环境等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关于翻译对语言发展及文化融合的不可比拟的作用与贡献,古罗马的小普利尼早有中肯的论断。翻译的这两个特征恰恰符合语言的两个特征即语言需保持一定的规范性与纯洁性,同时语言也要与时俱进取得自身的不断发展。翻译与语言和文化发展的关系的一个经典的范例便是马丁·路德的翻译对现代德国文学与语言的发展所做出的历史性巨大贡献。当然,语境移植受到译语语言环境的接受意识、包容度及被译语境系统对于译语语言环境的价值度大小的制约。也正因如此,异化与归化、直译与意译等众多译学争论应该从跨文化语境移植学说得到根本的解释。因此,跨文化语境系统移植对翻译具有特殊意义。

迄今为止,语境的内涵始终未能得到真正的界定,而其外延却很大,有着广袤的领地,众多流派仍在不断开垦。但这些不同的流派是从不同的研究视角以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对语境的概念作着不同的理解,导致其概念内涵的多变和不确定性。但众多流派对于语境外延的多视角研究也使得跨文化语境系统作为翻译的核心问题凸显出来。迄今,跨文化语境系统的构成(层次、要素等)以及跨文化语境系统的生成、转换、移植等机制都有待进一步深入考察和研究,有待未来新的跨文化语境系统移植学派的开拓与耕耘。

跨文化语境系统移植具有强烈的文化特征与语言特征。具有中国译学研究特征的翻译学派也应该是以中西翻译理论共同平台为基础、以文化特征与语言特征的核心问题为研究重心的一个译学理论体系,因为中国译学研究特征是由中文语言环境特征所决定的,而中文语言环境决定了中国译学研究特征为以文化为主要背景,融文化学特别是美学与语言学为一体。

这里提出译学研究特征的概念,说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翻译理论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特点。例如,德国可以说是功能学派的中心地带,以色列、低地国家可以说是多元系统论学派的中心地带。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流派和女权主义翻译理论流派无疑也有着各自相对活跃的中心地带。因此,一个区域的译论流派有着大体的共同特征,如俄国(前苏联)的文艺学派、美国的语言学派(包括

结构学派和交际理论学派等)、美国的翻译培训班学派、法国的释意理论学派等。

跨文化语境系统移植学说符合中国译学研究特征,跨文化语境移植翻译学派的构建对于中国译学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中国有着博大精深的汉语语言文化传统和与西方同样源远流长的翻译史和译学理论发展史。愿中国自己的翻译学派早日出现在世界译学理论之林,中国的翻译学派和西方的翻译学派一定会建立起新型的互助互补关系,并对译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中国应有的更大的贡献。

关于中国译学研究的走向正在引起人们越来越大的关注与探讨。可以说,现在是建立具有中国译学研究特征的翻译学派的时候了。当然,这个话题已经超出本书的范围,故不宜赘述。不过,还是愿以下面的话来结束本书的前言:相信随着中西方译论研究的共同发展,在“西学东渐”之风继续劲吹的同时,“中学西渐”之风亦会愈刮愈猛烈。而强劲的东渐“西学”之风与强劲的西渐“中学”之风交融之时,当是译学之大幸事,译学发展的繁荣辉煌将指日可待。

本书作为翻译专业用书,适合攻读翻译专业的研究生、外语专业本科生、外语教师及对翻译理论感兴趣的人士或专业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人士参考。

本书所引译论中的斜体与黑体均系原文所加。

本书仅为解教学之眉急而抛出的一块铺路砖,不过聊尽心力而已。仓促之中,更由于资料和笔者学识所限,本书在编写、资料选辑整理等方面定很不尽人意,粗糙、疏漏、纰谬之处势所难免,尚祈专家学者批评、雅正。

杨建华
2008年1月

作者邮箱: youngox1257@163.com
youngox1257@yahoo.com.cn

目 录

Contents

上篇 古典西方译学理论

第一章 古代早期西方译论

- | | |
|---|----|
| 1. (罗马) 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 | 3 |
| 2. (罗马) 贺拉斯 (Horace) | 3 |
| 3. (罗马) 马尔库斯·法比乌斯·昆提利安 (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 | 6 |
| 4. (罗马) 盖·普利尼·塞昆杜斯 (Gaius Ceacilius Plinius Secundus) | 10 |
| 5. (罗马) 奥里利厄斯·奥古斯丁 (Aurelius Augustinus) | 12 |
| 6. (罗马) 曼里乌·波依修斯 (Manlius Boethius) | 13 |
| 7. (希腊) 斐洛·犹达欧斯 (Philo Judaeus) | 15 |
| 8. (南斯拉夫) 圣哲罗姆 (Saint Jerome) | 17 |
| 9. (英) 阿尔弗雷德国王 (King Alfred) | 18 |
| 10. (英) 罗杰·培根 (Roger Bacon) | 21 |
| 11. (意大利) 但丁·阿里盖利 (Dante Alighieri) | 22 |

第二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译论

- | | |
|--|----|
| 12. (意大利) 勒欧纳多·布鲁尼 (Leonardo Bruni) | 27 |
| 13. (荷兰) 德西德利乌斯·埃拉斯慕斯 (Desiderius Erasmus) | 31 |
| 14. (德)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 32 |
| 15. (西班牙) 胡安·卢斯·维韦斯 (Juan Luis Vives) | 36 |
| 16. (法) 艾蒂安·多莱 (Etienne Dolet) | 39 |
| 17. (法) 若阿山·杜·贝莱 (Joachim Du Bellay) | 41 |
| 18. (法) 雅克·佩拉蒂埃·杜·曼斯 (Jacques Pelletier du Mans) | 42 |
| 19. (英) 约翰·特雷维萨 (John de Trevisa) | 43 |
| 20. (英) 威廉·卡克斯顿 (William Caxton) | 45 |
| 21. (英) 卡文·道格拉斯 (Cavin Douglas) | 47 |
| 22. (英) 威廉·廷代尔 (William Tyndale) | 47 |
| 附: (英) 托马斯·莫尔 (Sir Thomas More) 对廷代尔的指控 | 52 |
| 23. (英) 威廉·富尔克 (William Fulke) | 54 |
| 24. (英) 菲尔蒙·荷兰德 (Philemon Holland) | 57 |
| 25. (英) 乔治·查普曼 (George Chapman) | 61 |

第三章 近代西方译论

- | | |
|--|----|
| 26. (法) 巴赫·德·梅西里阿克 (Bachet De Méziriac) | 64 |
| 27. (法) 尼古拉斯·佩罗·德·阿伯兰库 (Nicolas Perrot d'Ablancourt) | 64 |
| 28. (法) 加斯帕德·德·坦德 (Gaspard de Tende) | 67 |
| 29. (法) 达尼埃尔·于埃 (Petrus Danielus Huetius) | 69 |
| 30. (法) 安托万·乌达尔·德·拉莫特 (Antoine Houdar de la Motte) | 74 |
| 31. (法) 安托万·普雷沃 (Antoine Prévost) | 76 |
| 32. (法) 伏尔泰 (Voltaire (Francois-Marie Arouet)) | 77 |
| 33. (法) 夏尔·巴托 (Charles Batteux) | 78 |
| 34. (法) 让·勒·容·达朗贝尔 (Jean le Rond d'Alembert) | 81 |
| 35. (法) 皮埃尔·勒图尔纳 (Pierre le Tourneur) | 86 |

36. (法) 雅克·德力尔 (Jacques Delille)	86
37. (英) 亚伯拉罕·考利 (Abraham Cowley)	88
38. (英) 罗斯康门伯爵 (Earl of Roscommon)	90
39. (英) 约翰·德莱顿 (John Dryden)	95
40. (英) 亚历山大·蒲伯 (Alexander Pope)	99
41. (英) 乔治·阿伯丁·坎贝尔 (George Campbell of Aberdeen)	102
42. (英) 威廉·柯柏 (William Cowper)	104
43. (英) 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 (Alexander Fraser Tytler)	106
44. (瑞士—德国) 约翰·雅各布·波特玛 (Johann Jakob Bodmer)	112
45. (德) 约翰·克里斯托弗·高特舍特 (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	115
46. (德) 约翰·高特夫利特·赫尔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16

下篇 现代西方译学理论

第四章 现代初期西方译论

47. (德)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21
48. (德) 卡尔·威廉·冯·洪堡 (Karl Wilhelm von Humboldt)	125
49. (德)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玛赫 (Friedrich E. D. Schleiermacher)	131
50. (德) 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 (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	139
51. (德)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 (Friedrich Hölderlin)	144
52. (德) 乌尔里克·冯·威廉莫维茨-莫伦道夫 (Ulrich von Willamowitz-Moellendorff)	145
53. (俄) 瓦西里·茹科夫斯基 (Васил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Жуковский)	149
54. (俄) 亚历山大·普希金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150
55. (俄) 维萨利昂·别林斯基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151
56. (俄) 阿法纳西·阿法纳西耶维奇·费特 (Афанасий Афанасьевич Фет)	152
57. (俄)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52
58. (俄)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Добролюбов)	153
59. (英) 约翰·胡卡姆·弗里尔 (John Hookham Frere)	154
60. (英) 波西·比希·雪莱 (Percy Bysshe Shelley)	156
61. (英) 托马斯·卡莱尔 (Thomas Carlyle)	157
62. (英)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 (Edward Fitzgerald)	158
63. (英) 丹特·加布里埃尔·罗塞蒂 (Dante Gabriel Rossetti)	159
64. (英) 弗朗西斯·威廉·纽曼 (Francis William Newman)	160
65. (英) 马修·阿诺德 (Matthew Arnold)	164
66. (英) 约翰·珀西瓦尔·波斯盖特 (John Percival Postgate)	170
67. (英) 约翰·斯温纳顿·菲利莫尔 (John Swinnerton Phillimore)	174
68. (英) 约翰·鲁珀特·弗斯 (John Rupert Firth)	178
69. (意大利) 本尼迪托·克罗齐 (Benedetto Croce)	179
70. (法) 安妮·路易丝·杰曼·史达尔 (Anne Louise Germaine de Staël)	182
71. (法) 维克多·雨果 (Victor Hugo)	183
72. (法) 保罗·瓦勒瑞 (Paul Valéry)	184
73. (法) J. 马鲁佐 (J. Marouzeau)	185
74. (爱尔兰) 约翰·米林顿·辛格 (John Millington Synge)	185
75. (爱尔兰) 托马斯·麦克唐纳 (Thomas MacDonagh)	186

第五章 当代西方译论

187

76. (美) 埃兹拉·庞德 (Ezra Pound)	187
77. (美) 罗曼·雅各布森 (Roman Jakobson)	189
78. (美) 威拉德·奥曼·奎因 (Willard Van Orman Quine)	195
79. (美) 劳伦斯·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197
80. (美) 安德烈·勒菲弗尔 (André Lefevere)	203
81. (美) 尤金·奈达 (Eugene A. Nida)	208
82. (美) 赫伯特·库欣·托尔曼 (Herbert Cushing Tolman)	217
83. (美) 丁达·L. 戈雷 (Dinda L. Gorlée)	221
84. (美) 埃德温·根茨勒 (Edwin Gentzler)	225
85. (美) 玛丽亚·铁木志科 (Maria Tymoczko)	230
86. (美) 保罗·德曼 (Paul de Man)	236
87. (美) 凯瑟琳·戴维斯 (Kathleen Davis)	237
88. (美) 道格拉斯·鲁宾逊 (Douglas Robinson)	241
89. (美) 欧阳桢 (Eugene Chen Eoyang)	245
90. (英) 艾弗·阿姆斯特朗·理查兹 (Ivor Armstrong Richards)	249
91. (英) 西奥多·贺拉斯·塞弗里 (Theodore Horace Savory)	250
92. (英) 约翰·坎尼森·卡特福德 (John C. Catford)	256
93. (英) 彼得·纽马克 (Peter Newmark)	262
94. (英) 巴兹尔·哈蒂姆和伊恩·梅森 (Basil Hatim and Ian Mason)	270
95. (英) 苏珊·巴斯奈特 (Susan Bassnett)	277
96. (英) 西奥·赫曼斯 (Theo Hermans)	284
97. (英) 蒙娜·贝克尔 (Mona Baker)	290
98. (英) 罗杰·贝尔 (Roger T. Bell)	295
99. (英) 厄恩斯特-奥古斯特·格特 (Ernst-August Gutt)	301
100. (英) 利奥·希基 (Leo Hickey)	307
101. (英) 斯图尔特·贝茨 (E. Stuart Bates)	311
102. (澳大利亚) 迈克尔·亚历山大·柯克伍德·韩礼德 (Michael Alexander Kirkwood Halliday)	312
103. (荷兰) 詹姆斯·霍姆斯 (James Stratton Holmes)	319
104. (德) 沃尔特·本亚明 (Walter Benjamin)	324
105. (德) 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329
106. (德) 汉斯·伽达默尔 (Hans-Georg Gadamer)	331
107. (德) 沃尔弗拉姆·威尔斯 (Wolfram Wilss)	334
108. (德) 凯瑟林娜·赖斯 (Katharina Reiss)	339
109. (德) 克里斯蒂安·诺德 (Christiane Nord)	345
110. (德) 汉斯·J. 弗米尔 (Hans J. Vermeer)	352
111. (芬兰) 贾斯塔·霍尔兹-曼塔利 (Justa Holz-Mänttari)	357
112. (奥地利) 玛丽·斯奈尔-霍恩比 (Mary Snell-Hornby)	358
113. (奥地利) 罗伯特·布格兰德 (Robert de Beaugrande)	362
114. (加拿大) 让·保罗·维奈和让·达贝内尔 (Jean-Paul Vinay and J. L. Darbelnet)	367
115. (加拿大) 路易斯·G. 凯利 (Louis G. Kelly)	369
116. (加拿大) 谢莉·西蒙 (Sherry Simon)	373
117. (加拿大) 路易丝·冯·费拉德 (Luise von Flotow)	376
118. (比利时) 荷西·兰姆伯特 (José Lambert)	382

119. (西班牙) 安东尼·皮姆 (Anthony Pym)	386
120. (以色列) 吉蒂昂·图里 (Gidion Toury)	390
121. (以色列) 伊塔马·埃文-佐阿 (Itamar Even-Zohar)	396
122. (以色列) 雷克费特·希拉-谢菲 (Rakefet Sela-Sheffy)	405
123. (捷克) 维莱姆·马泰修斯 (Vilém Mathesius)	411
124. (捷克) 安东·波波维奇 (Anton Popovič)	412
125. (捷克) 吉里·列维 (Jiří Levý)	413
126. (法) 乔治·穆南 (Georges Mounin)	416
127. (法) 乔治·斯坦纳 (George Steiner)	419
128. (法) 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427
129. (法) 达尼卡·塞莱丝柯维奇 (Danica Séleskovitch)	433
130. (法) 玛丽亚娜·勒代雷 (Marianne Lederer)	438
131. (法) 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443
132. (法) 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445
133. (法) 让·雷内·拉德米拉尔 (Jean Rene Ladmiral)	447
134. (法) 安托瓦纳·贝尔曼 (Antoine Berman)	448
135. (法) 亨利·梅肖尼克 (Henri Meschonnic)	449
136. (法) 安帕罗·于塔多·阿尔比 (Amparo Hurtado Albir)	450
137. (前苏联) 科米萨罗夫 (Комиссаров В.Н.)	452
138. (前苏联) 加切奇拉泽 (Гиви Р. Гачечиладзе)	456
139. (前苏联) 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 (Корней И. Чуковский)	457
140. (前苏联) 日尔蒙斯金 (В. М. Жирмунский)	458
141. (前苏联) 安德烈·费奥多罗夫 (Андрей В. Фёдоров)	458
142. (前苏联) 巴尔胡达罗夫 (Л. С. Бархударов)	459
143. (波兰) 泽农·克列曼塞维奇 (Zenon Klemensiewicz)	461
144. (保加利亚) 安娜·利洛娃 (Anna Lilova)	461
145. (保加利亚) 西杰尔·弗洛林 (Segel Florin)	463
146. (瑞士) 沃纳·科勒 (Werner Koller)	463
147. (意大利) 大卫·卡坦 (David Katan)	465
148. (爱尔兰) 道格拉斯·海德 (Douglas Hyde)	469
149. (爱尔兰) 詹妮·威廉姆斯和 (芬兰) 安德鲁·切斯特曼 (Jenny Williams and Andrew Chesterman)	470
150. (巴西) 德坎波斯兄弟 (Haroldo & Augusto De Campos)	474
151. (印度) 泰贾斯维尼·尼南贾纳 (Tejaswini Niranjana)	475
152. (印度) 伽亚特里·斯皮瓦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478

上篇 古典西方译学理论